

# 寻踪古今 问学中西

张西平教授七十华诞颂寿文集

主编 杨慧玲 李 真



學苑出版社

# 寻踪古今 问学中西

张西平教授七十华诞颂寿文集

主编 杨慧玲 李 真

學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寻踪古今 问学中西：张西平教授七十华诞颂寿文集 / 杨慧玲，李真主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077-5449-0

I . ①寻… II . ①杨… ②李… III . ①东西文化—文集 IV . ①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060477 号

出版人：孟 白

责任编辑：李 媛

印制总监：张 翔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010-67601101（销售部）、010-67603091（总编室）

印 刷 厂：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1092 1/16

印 张：24

字 数：320千字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谨以此书献给  
张西平教授七十华诞

# 无问西东



2004年张西平与  
卫匡国像



张西平教授在任继愈先生指导下  
进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  
汉学研究领域，1995年创办《国  
际汉学》



2012年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代表团与梵蒂冈图书馆合作项目签约



2013年与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教授合影

# 如切如磋



2008年《马礼逊文集》首发式



2016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师生合影



2017年那不勒斯罗明坚  
国际学术会议师门合影



2017年与弟子、同事参加学生  
毕业典礼

# 杏坛耕耘



2008年师生合影



2011年师生欢聚



2013年师门齐聚五塔寺



2016年师门学术沙龙

## 七十自叙：我的学问之路

### 一

我是“老三届”高中的毕业生，转眼之间，我们这一代人都将先后进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虽然从知青时代读书已经成为我生活习惯，但真正的学术研究道路起步比较晚，32岁时从湖北襄樊的总后部队院校考入当时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开始比较正规的学术训练，40岁时才完成了硕士研究生教育。记得1988年从社科院研究生毕业时，我要比同班年龄小的同学整整大一轮，在班上同学们都称我是老大哥。读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当代西方哲学，方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选得的是卢卡奇，导师是徐崇温先生。在哲学所的3年使我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学问、人生的看法都有和以前很大的不同。我在哲学所读书时，贺麟先生、杨一志先生、王玖兴先生、容肇祖先生、王明先生、虞愚先生都还在，叶秀山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他专门安排这些老先生给我们上课，我由此也能听到这些学术前辈的教诲。1994年我到德国访问时，还是贺麟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信，出国前贺先生的高足范进领我到干面胡同8号看望了贺麟先生。薛华先生更是对我多有帮助，我到德国访学就是他推荐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不仅在精神上极为困顿，在工作上也遇到极大的困难。刚刚40岁，竟然一时找不到生活着落之处。此时，我的学长、现在已故的姜国柱先生将这件事告诉了任继愈先生，希望任

先生能帮助我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工作，后来哲学所王树仁等老师也都给任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不久任先生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清了我的情况。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他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唐副馆长的支持下，我顺利调入了北京图书馆，开始了我新的生活。

此时，在我学术上极为困顿，我希望从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中国哲学研究，就向任先生请教，如何开始我的学术转型。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任继愈先生的办公室里，他给我说，“你可以做做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你做过西学，有些基础。对学术转型有帮助。这方面中国学术界做思想史的只有何兆武先生，研究的人不多”。感谢任继愈先生在我思想恍惚之时给我指出了一条崭新的学术之路。这以后的十余年间，我曾多次登门向先生请教，三里河的南沙沟成为我常去的地方，我也把自己作为先生的私淑弟子，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学术才完成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正是在他的教导下，我才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先贤和前辈吸引了我的目光。陈垣先生此时成为我的偶像，方豪先生的书几乎每天都要翻来翻去，我寻找过向达先生散失的书籍，访问过王重民先生的后人，认真读过袁同礼先生所编的汉学书目，读着他主编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我一本本寻找藏在国家图书馆中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和汉学书籍。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6年给我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好学术环境。在夕阳的余晖之下，我在善本部的阅览室中逐本翻阅了北堂的摇篮本；在港台室的晨曦之中，我第一次借到了《天学初函》；在这里我找到了方豪主编的《上智编译馆馆刊》，看到了藏在善本部里的利玛窦地图的残卷，还发现了一些尚未编入北堂书目中的一些传教士的手稿。同时，学术的圈子也开始扩大，在这一时期我结识了历史所的耿昇先生，宗教所的卓新平先生，认识了中华书局的谢方先生、杭州大学的黄时鉴先生，开始比较密切地与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何高济先生和张凯先生交往。

也就在这个时候，任先生找到当时国家图书馆的焦树按先生、出版社刘卓英主任和我，希望我们编辑一本反映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杂志《国际

汉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恰好我的德语老师弥维礼（Wilhelm R. Müller）也是一位汉学家，得知此事后慷慨解囊，资助了《国际汉学》第一期的出版，为此，任先生还在国家图书馆的红厅接待了他。同时，在编辑《国际汉学》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严绍盪先生、孟华先生、李明滨先生、许明龙先生。在学习中交往，在交往中学习，谦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结识的这些朋友的知识都如此渊博，学问都是那样的广博和扎实，而自己正像一个从石头缝中长出的小草，虽然有足够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毅力，但在知识和学问上缺乏养分和阳光，没有丰厚的土地的支撑，明显感到先天的不足。

1994—1996年我在德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访问学者，十分荣幸，我是研究所“陈垣奖学金”的第一位获得者。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德语老师，当时《华裔学志》的主编弥维礼先生面带微笑地告诉我，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可以安心到我们研究所做研究了。其实在到《华裔学志》研究所以前，我并不知他们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知道那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好的汉学研究所。

Sankt Augustin是一座美丽、安静的小镇，《华裔学志》研究所坐落在一片浓密的树林旁，坐在研究所的阅览室读书时常常看到门外的小松鼠在林间跳跃；每天在上下午休息时，推开阅览室的玻璃大门，可以踏着林中厚厚的落叶散步；穿过浓密的树林，在研究所的后门外便是一望无际的麦地，远处就是莱茵河。每天除了听到研究所后面的树叶在微风中瑟瑟作响以及修道院那悠远的钟声外，一切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忽闻江上弄苦箏，苦含情，遣谁听？烟斂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没想到在异国体会到了苏轼的《江城子》中的况味。静才能定，正是在这里我的心境才慢慢从国内当时那种浮躁的状态中转了过来，逐步安静了下来。

研究所的汉学藏书量在德国是屈指可数的，实际上当年老辅仁大学的许多珍贵的图书版本，有不少藏在了这里。有次在读一本善本时我竟然在书后当年的借阅卡上发现了陈垣先生的名字。这里不仅有书，还有很好的汉学家，我在时，从主编位子上退下不久的布恩礼（Heinrich Buch S.V.D，1912—2002）

先生还健在，他每天会准时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会儿。他是中国著名学者余嘉锡的亲授弟子，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当听他慢条斯礼地讲《华裔学志》在北京的故事，如数家珍地回忆他与陈垣、张星烺、英千里的交往时，你才会感受到这个研究所跳动的灵魂。《华裔学志》在西方汉学的重要地位建立在对对中国基督教史和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之上，它实际上是将这两个方面有机融合在一起，无论是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是研究此间传教士的西文著作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华裔学志》都是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sup>[1]</sup>

我访问期间，马雷凯教授（Roman Malek）出任研究所所长和杂志的主编，他本人的学术方向是研究中国的道教，但他担任所长后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基督教史和传教士汉学。马神甫为人豪爽，正当壮年，我们年龄相近，义气相投，每逢佳节，觥筹交错，畅谈至深夜。

在Sankt Augustin的日子并不算长，但它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使我决定从传教士汉学做起，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

1996年我从德国访学回国后，在国家图书馆的参考研究部社科咨询室工作，此时的国家图书馆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往日那种对学术重视的氛围已经渐渐淡化，而对经济指标的追求却日益具体化了。我在德国访学时所定下的展开海外汉学史研究的计划在那时根本无法实现，每日望着社科咨询室来去匆匆的咨询者，我心中茫然。此时我感到在国家图书馆已经无法展开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当年在国家图书馆做学问的几位好友也都纷纷离去，任先生的高足方广镛调走了，做中国文学史的张国风调走了，我的好朋友李凭也正在调往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这样我也下了决心离开国家图书馆。

6年的时光，紫竹园相伴，在风起日落、花开雪飘中我行走在玉泉路与国家图书馆之间，此时真要离去，我还是有一种留恋的感情。因为，正是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国家图书馆接受了我。我感谢任馆长、金宏达副馆长、唐副

[1] [德]巴佩兰（Barbara Hoster）著，谢蕙英译：《〈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32卷第2期，2004年。

馆长等一切关心过我的领导。国家图书馆这段时光对我的意义在于，正是在这里，我在任继愈先生的指导和关怀下，开始了自己学术方向重大转折，海外汉学研究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成为我以后研究的领域。我忘记不了在港台室安静的书桌前，我阅读《天学初函》时的喜悦，至今还清楚记得在善本阅览室第一次看到北堂书时的激动。在参考部的办公室里我多次静静地听着王丽娜老师讲她的《红楼梦》在国外传播的研究，王丽娜老师要编辑一本国家图书馆的汉学书目的理想，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也成为我的梦想。最重要的是1994年在这里由任先生的亲自倡导的《国际汉学》得以创立，它成为我以后展开学术研究的阵地。这一切都来自我的国家图书馆时代。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莱顿汉学院结识的好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王筱云把我介绍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程裕祯老师。其实当时我正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之间选择，是回到哲学所重新做西方哲学研究还是到刘梦溪先生那里主持《世界汉学》杂志，我曾经犹豫过。但最终我选择了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定下这个决心有三个原因：其一，当我向任先生表达希望离开国家图书馆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工作时，任先生说：“到那里对你合适，你要认真考虑，但我希望你将《国际汉学》的编辑工作继续做下去。”在先生眼中，《国际汉学》这份学术辑刊的分量是很重的。恰好，在我选择的三个单位中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地方；其二，程裕祯老师对我十分宽厚，他对我说，“你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后主要主持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你可以放手去做，我会全力支持你。听到这些话，我就感到十分温暖，感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或许是我完成学术转变的地方；其三，北京外国语大学所拥有的外语实力将是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今天看来，我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确的选择之一。

1996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青年政治学院旁的茶馆中，程裕祯老师请我喝茶，作陪的还有宋柏年老师，程老师告诉了我正式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十分高兴。因为，那年我已经48岁，在这样的年龄变动工作已不太容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感谢程老师，感谢陈乃芳校长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正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21年，不仅完成了我自己学术的转变，同时，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也在这所有着悠久历史和良好学术氛围的大学中成长了起来。

## 二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学术会议是“海外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战略研讨会”，任继愈先生、汤一介先生都来参加了会议，研究海外汉学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的严绍璁老师、已故的周发祥先生都在会上做了发言。这次会议算是汉学中心在学术界的一个亮相吧，其实当时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完全是个“三无”研究所，无编制、无费用、无办公地点。我当时每周要上10个小时的课，研究完全是业余的事。程裕祯老师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想了一个很妙的主意，就是让每年调入中文学院的新教师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协助工作一年。于是我开始有了“兵”，第一个来协助汉学中心工作的就是从瑞典回国的李明老师，她的到来使这个“三无研究所”有了生气。李明在瑞典工作多年，对欧洲汉学比较熟悉，她的先生高建平也是《国际汉学》的编委，这样我们的工作开始活跃起来。李明快人快语，对汉学研究也很有热情，不久她就请来瑞典驻华的公使来中心做报告，《国际汉学》的文章也开始有了介绍北欧汉学的文章。第二年来协助汉学中心工作的马晓冬老师，她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工作很有热情，也就是在她主持《国际汉学》编辑部期间，我们开设了“汉学一家言”栏目，开始对汉学这个研究领域的方法、对象等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那时，汉学中心的办公室在学校西院日研中心二楼的一个过道房间里，面积不过5平方米，我们3人开个会，房间就坐满了。每天中午，上完课后这间5平米的斗室成为我们3人商量稿件的地方。我在《国际汉学》第5期的编后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心境。“‘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是当年吴宓、陈寅恪等先生为《学衡》杂志定下的宗旨。人世沧桑，星转轮回，我们的学术偏离前辈所确定的这条坚实的道路太久了，当我们刚刚返回到大师们的桌前，铺天

盖地的商品大潮已使京城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三两书生，几位好友，为了一种学术理想，为了续下大师们的薪火，一面教学，一面编辑这份读者不过千人的小小刊物，其中的苦乐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学问本来就是‘荒山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之人商量培养之事’，编辑这份刊物毫无世俗功利之心，也不想让她成为媒体炒作的‘朝市之显学’”。艰辛而平静是当时研究所的基本状态。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学术界做的第一个较大的学术活动是1998年与中外关系史学会和杭州大学历史系合作，在杭大联合召开了“1500—1800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耿昇先生、杭大历史系的黄时鉴先生当时都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家，与他们的合作，进一步使我明确了由历史入汉学史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会议是在1998年的初春召开的，当时，春意料峭，西湖的杜鹃花和海棠含苞欲放，而会场内的学者们的研究气氛已是百花盛开。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美国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学者魏若望先生（John W. Witek, S.J.）等国内外的许多学者。这次会议的成功主要是程裕祯老师的功劳，因为，在三方合作的协议中，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要出1万元，这个数对于我们这样的“三无”研究所是一个天文数字。此时，程老师从他的朋友那里化缘来了1万元，才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认识了陈乃芳校长，使学校开始注意了汉学中心的工作。陈校长当时正在杭州招生，也顺便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并约我谈话，了解了汉学研究中心的情况。当她得知了研究所的实情后，感到学校应该支持海外汉学研究，会议后就决定每年学校给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万元活动费用，从此，我们由“三无”研究所变成了“二无”研究所，总算有了点固定的学术活动费用。

1998年对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7月我受比利时南怀仁基金会邀请参加了南怀仁基金会在鲁汶大学召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研讨会”，会后我到巴黎访问了巴黎利氏学社，参观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馆，遣使会的档案馆。在罗马时访问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在罗马见到了我的德语老师弥维礼先生，他也是把我带进这个研究领域